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杨颖 高洪艳 靳晓楠

编者按:从一支钢笔到营养餐、补习班、学区房……恢复高考30多年来,高考的“配套成本”与日俱增,再加上商家“煽风点火”,“高考经济”已然向着产业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只是,这近10万倍的成本增加,真的物有所值吗?

尽管学生们屡屡挑战极限、家长们也是倾其所有,但是这样的付出和努力似乎并没有换来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上好学校难”导致家有考生,草木皆兵,不过,这可乐坏了做教育培训的一帮人。只是,这些人给家长和考生提供的,是缓解压力的灵丹妙药还是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的大噱头呢?

我们的高考 我们的时代

“上世纪70年代,一本练习题、一碗绿豆汤,高考花费0.5元;80年代,考前买套好文具,花费10元;90年代,买复习资料、喝妈妈熬的鸡汤,花费350元;2000年代,请家教、租宾馆,高考花费5000元;2010年

代,一对一补课、订营养餐、租学区房,花费4万元……”对于家有考生或者亲身经历过高考的中国人来讲,这份网上流传的“高考成本变迁示意图”一定勾起了很多人或喜或悲的回忆。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随着镜头,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迁,高考作为消费的概念,渐渐萌芽,并且正在开枝散叶、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一个产业。



70S

煤油灯“熏”出大学生

老王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也是高考的受益者。至今,回忆起当年为改变命运做出的努力,他仍然感慨良多。

“那时候,我白天下地干活儿,晚上读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陪着我读书的煤油灯和母亲用攒了很久的钱给我买的一支钢笔。”老王说,对于那代人来说,考上大学才能改变命运,所以,大家的学习劲头儿都很足。虽然只有学长或者家里哥哥姐姐用过的几本课本、一盏煤油灯和一支钢笔,但那种想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还是支撑着他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此后,高考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老王回忆道,在其后的10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高考是不算消费的,正常读书,正常考试。哪怕当时的高校录取率不到20%,但70年代的考生及其家长大多都淡定平和地对待这样一道人生岔道口,就像面对人生中的其他路口一样,平淡无奇。哪怕“高考改变命运”喊了很多年,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花销,顶多也就是在饮食方面比平时更注意一些。

点评:时移世易。如今,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学生的压力却与日俱增。这其中,就有不少压力源自于高考隐性成本的增加。

不给孩子吃“生命一号”、订营养套餐,怕他身体不够格,输在比赛的起跑线上;不给孩子报补习班、请家教,怕他耽误学习,被勤奋的同学抄了小路;不给孩子调个好学校、租学区房,怕他没有好环境,接受不到最优质的教育。这样七七八八算下来,现在,培养一个大学生,首先要过“钱”这一关。

高考不息,父母的奋斗必然不止,但如此奋斗,到底是给孩子创造了便利,还是增加了负担,需要父母们好好思考。



90S

复习资料“救”活小书店

80后小郑已经大学毕业5年了,但每每想起高中、高考,最先念叨的,还是那些复习资料。

“我印象最深的是高三那年参考资料比课本还多。课间去趟洗手间,回到座位的时候便会看到各科模拟试卷‘像雪花一样飘下来’,盖在课桌上厚厚好几层。学校里老师发试卷,家里还有父母给买考前辅导书呢。”小郑笑言,“哪里做得过来啊,很多书都是全新着压了箱底,或者送给了表弟表妹或者父母同事的孩子。”

小郑说,那时候,每个中学门口总有一两家文具店、书店,生意好的不得了,考试用的2B铅笔、特制尺子等商品经常断货。不过,最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是一家叫席殊的书店。本来,这家书店走得是小资文艺范儿,里面有小郑喜欢的散文、小说、漫画书。可是有一次,老板抱怨说生意总是不温不火,很少有学生顾上看那些书了,所以决定引进点“应景书”。

老板所说的“应景书”,便是被小郑“鄙视”和“抛弃”的高考复习资料。可没想到,书店的生意借此越来越火,最后几乎是专营教辅书籍了。老板尝到了甜头,摸清了门道,还在其他学校附近开了分店。

点评:到底是为了做题而学习,还是要学会做题,这是个看似不矛盾,但其实很纠结的话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要让孩子掌握知识,懂得学以致用,但由于最终考核你成绩的是几张考卷,所以,研究这些考卷成为不少人的事业,也带动了一条产业链的发展。

每当高考临近时,总有专家说做完这些参考书就能抓住考点、重点,不管你信不信,很多家长是信了。不管成本有多高,家长们该“淘”的书都“淘”了。只是,买到参考资料不过是让自己安心罢了,能否达到效果,还要看孩子能否找到学习的方法,否则,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新世纪

课外小灶“焙”出新产业

菲菲是地地道道的90后,相对于很多同龄人来说,她的高中时光过得十分惬意,原因是她的父母比较开明,没有刻意要求她学业上的成绩。但她的同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有一次,我的好朋友跟我抱怨她的课余时间全都奉献给了高考培训班,基本上是刚下课就上课。而且每天都要喝一堆补充脑力的营养品,也不知道靠不靠谱。”菲菲说,她的不少同学都有过补习的经历,甚至有些同学的父母为了孩子上哪所培训班意见不合闹别扭。

菲菲提到,她刚上高中的时候看过一部韩国电视剧叫《追赶江南妈妈》,讲的就是父母望子成龙的故事。“后来,我眼看着身边同学的父母为了孩子的学习算盘打得贼响,很多父母高价聘请老师到家里教学,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对一辅导。”菲菲说。

“在那种情形下,我的父母也开始有些着急了,跟我商量需不需要补习,怕他们的‘疏忽’导致我输在高考的起跑线上。为了慰藉父母,也为了试试看是否真那么神奇有效,我也报了一个英语补习班。不过,我觉得自己英语成绩提高,还是因为喜欢学、想要学。”菲菲说。

点评:现在,多数家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摩拳擦掌“盯”高考。为了帮助孩子们提高成绩,很多家长都给孩子开了课外“小灶”。

于是,各种帮助高中生提高成绩的培训机构应运而生,发展前景也十分乐观。只是,如果这些机构不过是学校外一个集中写作业的地方、不过是把优秀的老师召集起来为孩子们批作业,相信,也难以长久存在下去。现在,我们的教育机构已经在思考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并在不断探索最优的教育方案,家长们也在动着让孩子去国外接受教育的心思,培训机构如果不能跟上形势,最终也将被淘汰。

上“班”入“网” 高考培训向多元化发展

喊着“知识改变命运”的70后、80后唱着“再也不能这样活”,挤过了高考独木桥,轮到90后显神通的时候,“独木桥”变成了“大板桥”。可是,高考录取率在由不到4%上升到70%以上的同时,家有考生,草木皆兵,高考焦虑症已经成为一种迅速蔓延的社会病,“再也不能这样学”成为缓解这一病症的心理安慰剂。

那要怎样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名校独木桥”已经催生出了一个巨大的教育培训产业。作为民办教育的一部分、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该产业实际上已经有大约3000亿元的产值。

不能回避的是“应试”的初衷。“我们国家

的教育培训更多是针对应试教育体系而言的。”熊丙奇说,由于升学考试贯穿整个教育过程,招生模式对培训行业产生了一些影响,培训也更倾向于帮助考生提高分数、提升考场竞争力。

北京英才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张立群告诉记者,现在最火爆的高考培训课程是课后补习班(小班、一对一),自主命题考试培训、艺考培训等都是应不同的招生模式发展起来的,颇受家长和考生欢迎。

张立群介绍说,在大城市,学生的课后补习班早已常态化,家长在这方面每个月的投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上万元。在校外辅导机构里面,名师一对一的收费有的甚至高达600元/小时至800元/小时。

“花这么多钱,都是为了‘考分’这个命根!”张立群说。

不过,难就难在如何让家长觉得这笔钱花得值。对此,各类培训机构真是费了一番心思。张立群告诉记者,在国内各大培训机构纷纷上马各类辅导班的同时,他们公司另辟蹊径,客户全部是学校,主要帮助其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满足各地高中对国内名校内部试题的需求。通过签订资源互换协议,收集全国的名校试题,整合之后,通过邮寄提供给全国各地的客户。二是针对“小综合”等高考改革思路和命题,邀请高考专家为各省市一线教师解惑答疑。公司成立7年来,已经在全国累计举办了246场培训。

目前,高考培训产业确实已向多元化发展。张立群预计,随着家长和考生对在线学习的认识不断深入,在线视频辅导会占据更多的市场份

额。国外已经有人把大学课程移植到互联网上,实现公立学校的教育功能。

不过,一位曾经供职于学大教育机构的职业经理人告诉记者,高考培训有其特殊性,就高考培训而言,最有效效果的依然是“一对一”的个性化教育。目前的网络教育还不支持互动功能,不能对每个学生进行准确诊断和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尤其是“两三”(初三、高三)学员,需求比较明确,需要在短期内提高成绩,要求能提供有针对性的知识点培训。目前,网络教育只能提供固定的培训内容,不能自动识别单个学生的问题。因此,就现在来看,网路教育还不能替代面对面教学。短期内的考试培训还是以面授为主,网络为辅。

张立群也没有否认在线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比如家长对网络学习不认可、在线教育互动性相对较差、需要学生有很强的自制力等。

对于教育培训行业存在的问题,业界人士给予了分析。上述职业经理人表示,很多高考培训机构都在高速扩张,给机构人员、财务等各方面带来挑战。培训机构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制造企业,无法通过标准化、流程化解决规模扩展的问题。培训是“批发”模式,一次订购多次课程,生产(教师授课)和销售(学生学习)同时进行。这种特殊产销模式决定了培训机构内部管理的复杂性。

熊丙奇还指出,现在,很多教育培训机构既像企业又像学校,同时既非企业又非学校,因此处于一个规范监管的灰色地带,从而会产生从业人员水平不高、教育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欺诈等问题。

教育产业:繁荣背后的失衡

当有家长在高考培训机构为孩子预存50万元学费的时候,在一个偏远山村的教室里,高三的孩子们正在啃着大饼充饥。

这就是中国教育资源不均等的现状。扎眼,但不容回避。

当“上学难”逐渐成为历史的时候,“上好学校难”成为家长心中的痛。为了能有一个好小学、好初中,学区房、奥数班成为家长们趋之若鹜的对象。而为了能上一个好高中、好大学,在高考培训机构一掷千金已不再是一件新鲜事。

教育产业化背景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依旧只有8.9%,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催生了市值数十亿元的“学大”和“学而思”们。但是,这种依靠大量金钱换来的竞争优势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承担得起的。这就产生了不公平。

这种繁荣背后的不公平是阻碍我们整个民族发展的绊脚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人生公平的起点。因此,完善教育保障,提供尽可能公平、均等的教育政策和资源,既有利于提高民族素质、增强落后地区群体的竞争力,也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在传统中国社会,教育体制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但在教育体制改革、教育产业化程度不断深化的今天,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命运的通道日趋狭窄,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逐渐加速。因此,解决教育不公问题是事关整个国家未来走向的重要问题。

教育不公的根基在于社会基础环境不公。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了大多数优质教育资源,农村和边缘贫困地区的学校却因生源问题难以继。即便在同一城市,不同学校占有资源也存在巨大差距。学校之间地位不平等,直接导致学生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

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虽然是市场的选择,但教育是一个兼具市场与公益双重属性的行业,不能够因为市场的选择而放弃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政府应当利用政策的倾斜,加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建设,平衡城市与农村的教育资源,消除学校的“等级”,促进教师资源的流动,确立更多促进教育公平的机制。我们甚至可以效仿MIT、耶鲁等名校的公开课,由政府牵头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高中名校公开课计划,利用网络和廉价移动设备让边远山区的孩子们也有机会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消弭横亘在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鸿沟。

